

徐旭生 著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Zhongguo Gushi de
Chuan Shuo Shida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210.7
X826



郑州大学 *04010231678W*

中国古史 传说时代

徐旭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5633-4227-3

I.中… II.徐… III.中国-上古史-研究
IV.K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225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乔庄村 邮政编码:101100)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1 字数:270千字

2003年10月第1版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2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徐旭生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古史专家、考古学家。

徐老早在半个世纪前，以长达三十年的持续研究，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这本书，是对中国上古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

这本书，凝聚着徐老的心力，蕴含着他的独到的学术见解。

其一，中国上古的历史，按司马迁《史记》，从黄帝时起，开始揭示文明时代的序幕。

黄帝，中国人文初祖，生长于姬水之滨，发祥于今陕西黄土原上。这时“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国语·鲁语》），“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史记·五帝本纪》），已进到农业生产的社会阶段。他以军事武力东征西讨，南攻北战，统占了大河中游两岸地区，建立了中原部落大联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国家基础。从此，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由中原大地上依稀地映照四方。一个华夏文明古国，即将屹立在世界东方。

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号称五帝。徐老指出，这个时代，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是已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它曾经历过三次大变革：黄帝统占中原，过去部落林立的局面，经此大震荡，逐渐相互融合与同化，形成部落大联盟。此一大变也。颛顼时，“绝地天通”，大胆改革，人神分开，有人专管社会秩序方面的事，又有人专管宗教方面的事。劳心者与劳力者日益分化，氏族社会解体，特权阶级产生。此二大变也。大禹治水，主名山

川。人民得能“降丘宅土”，休养生息。生产发展，贫富不均。此三大变也。此等巨变，奠定了我民族的生活基础，孕育出伟大的华夏民族，建立了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从这里，可以探求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

其二，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新。当时，极端疑古派学者否定殷墟以前漫长时代的历史。对传说资料视若“腐朽”之物，或加偏见，或不引用。徐老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力图“矫正他们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使治此段历史的方法可以早入正轨”，使夏及其以前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他采用古代传说，经过审慎研究与考证，从中得出一个新论断。这就是：古代中国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大集团。华夏族地处黄河中游两岸中原地区，东夷族地处山东、安徽境内及其东部沿海地区，苗蛮族地处长江中游两岸的两湖及江西地区。三大族不断接触，始而相斗，继而相安，血统与文化逐渐交互错杂，终于同化，形成一种融合而较高的民族文化——华夏文化。证之考古学上仰韶、大汶口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交流与融合的情况，大致是近似的。徐老的论述，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

其三，徐老首先提出探索夏文化问题，不仅具有远见，同时，立下开创之功。

夏文化问题，关系到证实和补充夏代历史，关系到阶级社会的产生与中国国家形成等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夏王朝，《史记·夏本纪》已有系统的记载，但在考古学上却是一个空白点。为此，徐老极为重视，首次提出探索夏文化。并在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河南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夏墟”地带进行考古调查。尔后，二里头遗址、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就是在徐老踏察的启示下开始发掘的。

徐老对夏文化的探索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指出: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词包括着两个涵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二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原也是夏人的旧壤。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夏文化问题,取得了可喜成绩。山西陶寺、东下冯,河南王湾、姪李、白营、王城岗,煤山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早期文化,都是新中国考古的重要收获,也证实了徐老的卓见。

其四,关于研治传说时代的古史,徐老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识。他认为,必须认清什么是传说时代及如何对待和处理古史传说资料,这是个首要问题。

所谓“传说时代”,徐老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盘庚迁殷以前。

至于如何对待“传说时代”史料,徐老认为,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当然,二者之间是相近的,颇难截然分离,但也不能混为一谈。

神话,马克思说,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拉法格也说过:“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想像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想的朴素的和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有当我们猜中了这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3页。

神话对于原始人和它们在许多世纪以来丧失掉了的那种意义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的童年。”^① 所以,神话是基于社会生活的艺术的夸张与渲染,并夹杂着空想与幻想,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着历史的影像。然而它不太可能转化为历史。

古代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徐老认为,这些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过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加以区别,也不能笼统地把古史传说全归为神话。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密,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

只有这样,用历史观点作具体分析,才是对待传说史料的正确态度。

在探寻史实中,徐老认为:“只敢求其可知者,不敢求其不可知者。所采用的材料,甄选西周、春秋、战国人的早期传说,不敢轻易离析这些传说。”绝不能“称与我意相合者为真实,斥与我意不合者为作伪”。只有从具体材料出发,经过具体分析,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结论。也只有这样论证历史,才能把论断建立在真实历史资料的牢固基础上,才可成为“不易之论”。

对于古人,对于历史,徐老认为,“非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加以深思之后,实在不应粗心浮气,乱发议论”。这确是学者所应具有的气质。

徐老的这本书,确实是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深思之后而写出的论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珍视。

值此科学的春天,百花争妍。愿我们后学者学习徐老的谨

^① 《宗教与资本》,王子野译,2页。

严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沿着他开拓的新途径,在古史研究领域里去攀登新的高峰。

天 石

1984年9月1日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大意及例言

一、是书凡六章：“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论方法问题，自应列于首章。“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为全书的中心，必须此问题明而后他问题才可以明白，故列在第二。此后读者可按时代次序，先读附录二竺可桢先生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次读第三章“洪水解”。第四章关于徐偃王的问题已经超出传说时代的范围，但因为它是三集团问题的余波，所以也收在书里面。第五、第六两章所研究的问题按时代似应列在前面，但因问题的出现仅在战国或以后，所以列在最后。

二、我在开始写初稿的时候所有的意思，后来变更稍关重要的，仅有祝融一问题。开始我觉得他属于南方集团不成问题，但对于高阳苗裔一事，甚费踌躇。此后研究到祝融八姓的地域，才感觉到它们的地域多在北方，说它们由南迁北像是很远情理。最后才注意到“苗民弗用灵”句“灵”字的解释，才悟到祝融与南方集团的真正关系，如第二章第七节所说。自信此说对于各方面的古代传说皆无凿枘，或不致有大错误。

三、凡引用的人以称名为原则（不用字、号、谥等），但也以通用的为准。比方说：称孔丘、墨翟就未必能像称孔子、墨子的声入心通的容易，所以舍前名，用后名。近人有称姬昌、姬发、姬旦以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实则古人男子全称氏，女子才称姓，如果在当日这样称呼，当时人并不能知为谁何。称为周昌、

周发、周旦,与当日的习惯虽相符合,可是现代人对这些名字又多误会,采用通行的名字,自属一定的办法。

徐旭生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	(22)
第二章 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	(42)
第三章 洪水解	(148)
第四章 徐偃王与徐楚在淮南势力的消长	(190)
第五章 五帝起源说	(230)
第六章 所谓炎黄以前古史系统考	(253)
附录	
洪水故事的起源	(306)
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	(327)
读《山海经》札记	(341)
徐旭生先生传略	(356)
徐旭生主要著译目录	(365)

序 言

我这件工作于1939年春才开始，搜集探讨大约一年，次年春开始写作，初稿于1941年冬，前后经历约近三年。但是我有意从事这项工作却相当早。

回忆我自1921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日我国的史学界受欧西科学的影响，对古史材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我个人也未能自外于时代思想的潮流。不过因为我在法国留学时学的是哲学，所以在北大教的总不出哲学史的范围，对于历史自身没有时间向前深造。1923年前后顾颉刚、刘掇藜二先生，对于大禹是否天神，是否有实在的人格之讨论哄动一时，我对此问题虽也深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工夫搜集资料，所以未能参加讨论。当时史学界的普通意见似有利于顾氏，可是我个人虽对于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

我当日觉得《尚书》中《尧典》、《皋陶谟》、《禹贡》诸篇固然非当日的或离当日不远的著作，是由于后人的追记，篇首“曰若稽古”四个字已经可以证明。但是他们的记录未必无根据，记录的时期最早也或者可以溯到商朝。很久我就听到人家说：按着岁差的定律可以证明《尧典》上所记二至、二分的中星的确是四千年以前的中星。我因为想救出来《尧典》等三篇的材料，就想到天文上的现象大致可以说是按着恒定的规律变化的；现代天文学的进步可以说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精确程度。我们如果能用现

代天文学的精确知识证明《尧典》上所载的天文现象实在非四千年前不能有,那岂不是可以证明这种传说虽是登简策的时期相当晚,它自身却是很古老和可靠的传说么?这一部分可靠,岂不是就可以推想别部分也并不是向壁虚造,它因此也就可以增加了不少的重量么?这样的意思虽说很诱人,但是因为我个人对于天文知识仅仅有一知半解,所以无法达到目的。虽然如此,我当日总觉得这个问题颇为简单,只要得到当年的二至、二分在黄昏初见星时的中星宿度,就可以推算出来个大概。

我于1924至1925年请故友高鲁先生(当时任中央气象台台长)把这些数字及现在实用的岁差率告诉我。承他的厚意把这些及岁差率 $50''.25$ 开给我。我因为星鸟的范围太广,弃去不用。余下火(房)、虚、昴三宿,我也不能指定何星,仅仅拿《汉书·律历志》所记的各宿的度数(我当日相信它与两千年前所用的各宿度数虽未必全同,但总是比较相近的),用岁差率运算,看看在四千年前这些宿度是否全在限度以内,结果是有两个宿度范围很宽,在四千年前后固然在此限度内,但到三千年前后,中星仍未出此宿的限度内。只有一个宿度范围很狭,仅仅三千年左右可以在此限度内,绝无到四千年前后的可能性。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专家,所用的方法还达不到科学的精确性,所以未敢发表,算稿后来也完全遗失。但是由于此次推算才感觉到这些中星观测的时期不能超过殷、周之际以前;《尚书》这三篇文字不惟登简策的时期相当晚,就是那里面所记的事迹也全有为后代人所掺加的嫌疑。从前对于此三篇言录的古老性和比较可靠性还是若信若疑,自此以后,对于它那比较可靠性的信仰更有限制了,又过两三年后,才读到《科学》上所载,专家竺可桢先生所著

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①，欢喜赞叹，以为必须这样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因为这样的研究根据于最精确的科学知识，是有决定性的，不像对于古史其他的推断的可东可西。竺先生这一篇著作绝不是我那一次幼稚的试探所能比，不过我的结论同他的“《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的结论相比，居然还没有大差，这却是我很高兴的事情。

等到1932年我接受了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至1937年春改所）的聘约以后，才专心研究历史。不过接续五六年间总是在陕西的黄土原上面奔走，从事调查及发掘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工夫对于有文字的古史作进一步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个人也想回我们家乡的南阳，发动民众，以期对于抗战小有贡献，可是受到当日国民党当局的掣肘，不能有何种作为，只好又回到“北研”的原岗位上。1938年冬到昆明，次年春在昆明附近的黑龙潭定居。当时史学研究所在北平时所有的书籍几乎完全丧失，在昆明购买书籍又很困难，为事实所限，熟读古书遂成了当日工作的惟一途径。黑龙潭风景优美，远绝尘嚣，为读书时候的理想环境。因为在环境方面有这几个条件的促成，遂立意拿我国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予以通盘的整理。整理以先毫无成见。所仅有的就是我国近二十余年史学界中所公信一点观念：我国有记录历史开始时候也同其他民族的历史相类，这就是说，它是复杂的、合成的，非单一的。又有史学界多数承认的一点观念：专篇讲古代历史的文章，如《尧典》三篇之类，为受过系统化的史料——此后我把它叫作综合史料；见于先秦古书中的零星记载为还未经过系统化的史料——后一种的真实性此前一

^① 《科学》，1926年第10卷第12期。

种的高。

另外我个人还提出一点：把在不同时期记录下来的史料分为不同等级（详细载第一章“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中）。传说时代的范围，上限未能定，下限暂定于商朝的盘庚迁殷以前，因为到盘庚迁殷以后就已经有明确的史料，进入了狭义历史的范围，不属于传说时代了。工作的程序，是先把先秦古书中属于普通历史材料仔细检查一遍，并且把这些段落勾画出来，请人把它完全抄录在一个本子上以便检查（专书如《尚书》前五篇、《史记》前三篇等不抄）。至于伪《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列子》及其他嫌疑过大的伪书，暂时弃置不睬。

这样比较的结果，才看出我国古代的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仔细分析也未尝不可以分为六部分，因为西北方的华夏集团本来就分为黄帝、炎帝两大支，黄帝支居北，炎帝支居南。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单位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人。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部分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极深关系的祝融等氏族。这三个亚集团，除了华夏分黄、炎两大支很清楚外，其余两部分我经过相当长期的慎重考虑，觉得必须这样划分才能与古代情势适合。虽然如此，这三个亚集团是由原来的三集团中细分，不能同它们平列。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我们战国及秦、汉时代的人民常自称为华夏是错误的，他们实在是华夏、东夷、苗蛮三族的混合。我们常常自称为“炎、黄裔胄”，其实这种说法不能代表我们，必须说是羲、皞、炎、黄裔胄，或炎、黄、羲、皞裔胄，炎、黄代表华夏，皞代表东夷，羲代表苗蛮，才可以代表我们全体的老汉族（今日的汉族又混杂了很多族是很清楚的）。这些意见于1940至1941两年中逐渐

写出。又征求竺可桢先生的同意,把他那篇文章也收到我这本书里面。因为文章发表已久,所以作为附录。我个人对于竺先生著作的意见现在是这样:我不相信皇甫谧所说“尧都平阳”,“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①的说法,因为这些不是较古的传说。我相信陶唐氏的故地应该是在今河北省的唐县、望都一带。所谓“践天子位”后的新都与故土不同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天子位”一观念似乎是殷、周以后才有,就是夏朝及商朝前期未必有,何况再往前的时期。既然没有践天子位一事,又有什么建的新都呢?至少说:陶唐氏故土在河北省西部的传说绝不会比尧都平阳的说法更靠不住。竺先生专用平阳一说,似乎是美中不足。不过平阳同唐县纬度仅仅差两度多,平阳在北纬三十六度略偏北,唐县在北纬三十九度南,差异不大,希望不至于影响到他的结论。我不敢说竺先生的研究已经毫无疑问,但是他的工作方向极其正确,却是毫无疑问。这一类的问题,如果能研究得完全清楚,是有决定性的,希望读者千万不可忽视。我又请友人苏秉琦先生把 Frazer 的《旧约中的民间传说》里面关于洪水故事的起源的一部分摘译出来,又加上我个人所写《读〈山海经〉札记》作为此书的附录。竺先生的大作及苏先生帮我所作的翻译实在使我的这本书生光不少:这是我所应该在这里特别致谢的。

通过这一次研究我认为得见我国古代历史的轮廓,大约如下所说:

在我们中国的地域上面居有人类,是从极早的时候开始的。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中国猿人”遗迹可以证明,除了爪哇的直立猿人,没有比他们更古的人类。我们的考古事业开始得较晚,

^①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前工作有很多的限制,不容易展开,可是在这短短的三四年间已经得到“中国猿人”、“丁村人”、“河套人”、“资阳人”、“山顶洞人”一系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新遗址的发现还有很大的希望,就可以证明我们中国从很古的时代陆续有人类居住,这些人类同我们的现代人大约都有若干血统上的关系。不过他们与传说时代相离得还太远,暂时可以不谈。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公社的氏族社会已经高度发达,所发现的遗址很多,尤其是仰韶、龙山两大系文化同传说时代的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是关系的详知情形如何及如何地变化,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几乎毫无所知。我们也不敢捕风捉影地去附会,所以暂时也还不能谈。

我们现在的研究只能从有传说的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有一部分,此后叫作华夏族,内中有一个氏族叫作少典。它与有蚺氏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区域大约在今甘肃、陕西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从这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就叫作黄帝氏族;另外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这两个氏族发展以后,渐渐有一部分顺着河流,向东迁移。炎帝氏族所住偏南,顺着渭水、黄河的两岸,一直发展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搭界的地域。黄帝氏族所住偏北,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的北岸,随着中条山及太行山山根,一直到北京附近,或有顺着永定河岸到达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的。炎帝族到达上面所说的地方以后,就遇见本地的土著,以后叫作东夷的人民。两族相遇,遂相争斗。这个时候居住东方、领导东夷斗争的英雄叫作蚩尤。他本领颇大,炎帝支吃了大亏,往北方奔逃,求救于北方同族的黄帝支。黄帝支因为居住的地域多偏北方,为自然环境所限制,还滞留于游牧阶段,所以武力较强。他们出兵后,开始